

京韵大鼓不姓“京”

■罗君生

天津被称为“曲艺的发祥地”，是中国北方的“曲艺之乡”，这一美誉不仅全国驰名，而且闻名遐迩于海外。天津人爱听曲艺，尤喜欢鼓曲，特别是鼓曲艺术中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的唱词大气典雅，曲调豪放悠扬。自从1918年开始称为“京韵大鼓”，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人们都以为她是北京的曲种，其实“非也”，京韵大鼓不姓“京”而姓“津”，形成在天津。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证明，近在1995年天津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梓钰（1947—2002）又进行了一系列考证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京韵大鼓本姓“津”。

素有九河下稍之谓的天津是北京的门户，自600多年前建卫之始，就是因河而生因商而兴起，海河上桨声帆影，漕运繁忙，五方杂陈。河（海河）海（渤海）相接的特殊地理环境，蕴藏着独有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营造着独特的文化。繁华的都会与发达的工商业为民间艺术的萌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天津人在艺术欣赏上豁达开放、兼容并蓄的习性和心态，人们喜欢到游艺场所看戏听曲，大批的艺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津门竞技献艺，自然使天津这座水路码头成为了北方曲艺的荟萃之地。

清代嘉庆年间，随着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说唱艺术迅速发展。晚清的崔旭曾写诗描述当时的曲坛：

“琵琶清脆响流珠，宛转歌喉学凤雏。
小曲近来兴北调，当筵赢得一狂呼。”

河北省中部流入天津的“木板大鼓”，主要说唱《呼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等这类诵忠贬奸的中长篇鼓书，当时艺人说唱时带有冀中河间县一带



林红玉演出照。



骆玉笙演出照。



刘宝全演出照。

的方音，因此被城里人称为“怯大鼓”。为了适应天津观众的需要，“怯大鼓”改长篇大书为小段，以长篇书中精彩段落为主，在语言上吸收了不少天津方音，人们称其为“小口大鼓”。有些艺人尽管以天津为从艺的基地，但也常去北京演唱，自然会受到北京方音的影响，在上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天津有“说卫话带京腔”的时尚，由此发展而成“卫调大鼓”已是津字京音了。

当年木板大鼓向卫调大鼓发展时期的名艺人宋五（宋玉昆）、胡十（胡金堂）、霍明亮、刘增元等演唱的曲调基本一样。1894年他们曾在宝和轩同台演出，但受当时条件所限，他们皆无音响资料传世。在他们的演唱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张小轩吐字发音以天津语言为主，声腔宏亮、唱腔质朴。紧接着刘宝全在弦师韩永禄、白凤岩等人的协助下，将河北和天津的方音易为北京话，变唱腔的质朴平直为华丽、婉约、说唱结合、韵味醇厚从而形成了刘派风格，加之刘宝全先生将家迁至北京，他在北京的剧场、茶馆演唱后，北京有了追随者，有了学徒，“京韵大鼓”便约定俗成叫响了。第一个始称者是曹桂喜（黑姑娘），她于1918年在天津以此报名。再后来的白云鹏，他以不标准的北京音来演唱，并加以霸县乡音，唱腔委婉苍劲并有诵白色彩，行腔低缓有阴柔之美，从而形成了张、刘、白三大派，北京的演员来天津演唱成名后，返京驰骋，如白凤鸣、良小楼、章翠凤、马书麟、孙书筠等名家皆走的是这一条从艺之路。

关于京韵大鼓姓“京”还是姓“津”的问题，报刊书籍上也多有议论。《立言画刊》第131期（1941.3.29）署名舞厂的文章《天津三大鼓王》中讲：“叫做京韵大鼓，但发祥地却是离着北京240里地的天津卫。”韩世琦在《东亚晨报》（1943.1.5）发表《京韵大鼓之源考》文中说：“风靡一时之京韵大鼓，发明时期并不甚远，在清时代同治年间耳，有谓源自五代者，则属荒谬之论，且地点即为天津，有言出自河间府者亦为大谬。”著名的北京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著的《北平的俗曲》（刊于1947.5.27出版的《一四七画报》连载之十一）中说：“京韵大鼓乃津韵大鼓之讹传。”就连鼓王刘宝全也认为京韵大鼓姓“津”，1927年他曾对弟子谭凤元说了许多大鼓门里的掌故。其中也讲了：“津韵大鼓怎么又讹成了京韵大鼓的……的话语”（文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第42页。）

从上世纪初至今，天津人爱听京韵大鼓皆因天津名家众多，仅骆玉笙就演唱京韵大鼓70年，且久唱不衰，神州享誉。1985年骆老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更是风靡全国，让青年观众爱上京韵大鼓。天津是一方沃土，人才济济，一代又一代的鼓曲名家百年来不断改革，不断创新，铸就了京韵大鼓的辉煌。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繁荣民族艺术，百年京韵之路是对我们创新发展很好的启示！

（责任编辑 / 刘红英）